

配位：商鞅、王阳明与思想的“被需要”逻辑

作者 葡萄 · SDE 学员 · 金点子③ · 纠缠(E) · E3 · 能量 · 约 2.7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19日

摘要 · ABSTRACT

当代中国同时承受着两股对冲的力——效率与公平在分选机制中的撕扯，功利与意义在个体生命中的拉锯。每一种力都在寻找能顶住自己的支撑物；某些旧思想因其结构恰好能嵌入这个张力缺口而被“配”上去，完成一次临时的稳定。本文追问的不是思想如何影响时代，而是时代在持续的张力中如何挑选思想。以商鞅在当代分选机制中的持久在场与王阳明在中产精神消费中的周期性热退为对照案例，本文提出“配位”这一分析机制：一个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承受着某些无法消除的结构性张力，这个张力张开了一个裂缝；社会在已有的思想库存里搜寻——什么样的既有思想，它的结构恰好能同时从裂缝的两侧受力，能在其中卡住而不滑落？找到，就配上去。配位的核心判断是：只要当前社会运行的张力结构持续以“公平-效率”为表达形态，商鞅逻辑就不会退场——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当前结构条件下唯一被裂缝夹住而无法脱落的方案；而心学在个体心理层面的配位，因其自身硬度的缺失和替代品的丰富，随时可以被替换。本文指明证伪条件：如果社会在追求效率时找到了另一种同样能维持公平感、又不把人化约为通约指标的新分选机制，或相当规模的人群跨阶层地以心学的克己实践替代了功利竞赛的全身心参与——任一种情况出现，本文的核心判断即被证伪。

关键词 配位；商鞅；王阳明；结构裂缝；分选机制；精神配位物

一、一个被预设遮蔽的问题

把商鞅的“壹民于耕战”和王阳明的“致良知”放在一起，追问哪股力量对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塑造得更深——这个问法本身是一个陷阱。它预设了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第一，思想是一种有独立力量的主体，像台球一样在时间桌面上滚动、碰撞、停驻；第二，“影响”是一种可以度量的量，像赛跑一样可以比谁跑得更远。

这两个预设都经不起检视。如果思想真的凭自身的逻辑和力量就能穿越时间，那为什么同一种思想在不同的时代，有时被奉若神明，有时弃如敝屣？为什么《商君书》在秦亡之后公开层面的意识形态地位被儒家取代，其“壹民”的底层逻辑却从未离开过历代王朝的治理实践？为什么阳明心学在晚明是解放的旗帜，在清初是空谈的祸首，在当代又成了中产阶层的案头必备？变化的不可能是思想的内容——文本是死的。变的是社会在每一轮矛盾中，把旧思想的哪一个侧面捡起来、架在了什么位置上、让它去顶什么用。

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观察。此前已有研究提出过“位置”进路——分析思想在特定时代被架在什么社会势能之上、被期待承担什么功能。本文的工作是它的下一步推进。“位置”进路回答了一个问题：“思想被架在什么位置上？”但它没有回答一个更前一步的问题：**为什么是这个思想被架在那个位置上？为什么不是别的思想？**

这个追问的直觉不难把握，但把它推进到可操作的分析层面，需要说明它的逻辑是怎么被逼出来的。本文将依次展开两个对照案例——商鞅逻辑在当代分选机制中的持续在场，与王阳明心学在中产精神消费中的周期性热退——在追问中逐步逼出“配位”的完整机制，最后把它放进与既有解释的严肃对话中，接受检验。

二、商鞅的持续在场：裂缝如何配取配位物

（一）“效率焦虑”为什么解释不透

通常的分析路径是这样的：当代中国是一个后发追赶型社会，“怕落后”是弥漫在全社会的基础情绪——国家怕落后挨打，家庭怕下一代滑出中产，个人怕被同龄人甩在身后。这股焦虑需要释放出口。而商鞅的“壹民于耕战”——把所有的人力浇铸成统一规格的标准件、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产出——恰好是最简单、最不费事的释放出口。于是商鞅主义就被架在了效率焦虑之上。这叫“注入式”：不需要被作用者自愿接受，不需要被作用者记得商鞅的名字，只要焦虑还在运转，标准化筛选的机器就会自我维持。

这个分析是有效的，但它不够深。它解释了“为什么商鞅逻辑被反复使用”，但没解释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商鞅逻辑？**

当社会面临效率压力时，提高效率的方案并非只有“把人化约为一套可通约的指标”这一种。更精细的分工、更个性化的匹配、更灵活的选拔机制——在理论上都可以提高效率，甚至可能比标准化更高。但它们都没有成为当代中国筛选机制的主导逻辑。为什么？

答案不在“效率”这一侧，而在“效率”的对冲力量那一侧。

（二）“公平”对“效率”的约束：一道无法消除的结构裂缝

当代中国的分选机制——以高考为核心的高利害标准化考试体系——承受着两股对冲的力量。一股是效率压力：必须快速地从庞大人口中筛出“最聪明”、“最努力”、“最能适应高强度竞争”的人，把他们配置到最需要才智的位置上，以维持国家的竞争力。这要求分选机制越来越精准、越来越能识别个体差异。

另一股是公平压力。在一个以“平等”为核心正当性话语的社会里，分选机制必须让每一个参与者——和他们的家庭——都觉得“这是公平的”。否则分选的结果就失去了社会可接受性，随时可能引发严重的正当性质疑。

这两股力量的方向恰恰是相反的。效率要求识别差异：你是天才，他是庸才，你们不应该被放在同一个赛道上，否则对两者都是浪费。公平要求抹平差异：至少在起点上，你们不能被预先判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有同等的“试一试”的权利。

这个矛盾不是政策设计上的疏忽。它是结构性的：一个后发大国在追赶阶段不可能绕开的张力——既要效率，否则追不上；又要公平，否则稳不住。

需要说明的是，“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根本取舍”这一表述本身有其学术来源（Okun, 1975）。本文所处理的，不是这个取舍在经济学上是否成立，而是它作为一种被普遍体感到的张力，如何在中国的分选机制中张开为一道必须被堵塞的裂缝。

这里有必要交代这道裂缝自身的形成属性。它不是一道先于历史而存在的“永恒结构”，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并清晰化的。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主要不是靠标准化考试来运作的；那个时候，人们对“公平”的体感更接近“平均主义”——大家都不富裕，但也没有谁特别突出地占有比别人多得多的上升机会。高考恢复之后，数以千万计的人被同一张卷子排序，社会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被教化了这样一种体感：公平，就是一把尺子量所有人。换句话说，“公平-效率”这道裂缝，不是在标准化筛选推行之前就已经和今天一样清晰地张在那里——恰恰是标准化筛选的大规模运作，反过来让全社会学会了用“公平vs效率”这个框架来感知分选机制中的张力。裂缝的命名、形状、两侧力的体感，本身也是配位物参与塑造的。这不是一个永恒的结构常量，而是一个历史生成物——本文在使用“二律背反”这个表述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它不是一道超越历史的铁律，而是当前历史条件下这道张力的最凝缩的表达。

它张开了一个裂缝。裂缝的两侧分别是：你要精准地识别出个体的真实差异——为此你需要复杂的、多维的、长期的观察和判断，而这正是最容易被质疑为“不公平”的（凭什么你觉得他比我优秀？你的判断标准是不是带着偏见？）；你要确保所有人——尤其是被筛下去的人——都觉得公平——为此你需要一个最简单、最透明、最不容辩驳的标准，而这恰恰是最不精准、最不能识别真实差异的（一把尺子量所有人，量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差异，而是对这把尺子的适应度）。

（三）配位如何发生：1977年的历史现场

在给出了裂缝的形状之后，现在必须直面一个最关键的追问：这个“恰好能配上的方案”究竟是怎么被找到的？裂缝不会自己说话，不会站起来在库存里翻找。配位动作本身，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行动者、在具体的压力下、面对有限的可选方案来完成。本节以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为历史现场，展开“配位发生”的完整过程。

1977年，中国社会面临的是一个多重压力交织的时刻。“文革”刚结束，国家的人才储备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断层——高校已经有十年没有通过统一考试招生，取而代之的是推荐入学制度。推荐制的弊端在十年间暴露无遗：它名义上强调“政治表现”和“群众推荐”，实际上为走后门、拉关系提供了制度性空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在当时民间流传的话，精准地描述了推荐制在公平维度上的彻底失败。

恢复高考的决策，在当时面临着极为有限的选项。决策层面前大致有三个可考虑的方案。第一个是延续推荐制，但在操作上做一些修补——比如加强对推荐过程的监督、增加文化考查的比重。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是：推荐制已经在全社会丧失了公信力。无论是被推荐上去的，还是被筛下来的，都不认为这套机制是公平的。修补解决不了公信力崩塌的问题。

第二个方案是实行多元评价——综合考查学生的学业水平、平时表现、特长和潜质。这个方案在教育理念上似乎最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不可操作。十年积压的考生人数极为庞大——1977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两届考生加起来超过一千一百万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面对这么庞大的人群，任何包含主观判断的多元评价都会立刻崩溃：谁来评价？用什么标准评价？怎么保证评价者不偏袒自己的关系？更何况，经历了十年“走后门”的痛苦记忆之后，全社会对任何带有“人的主观判断”的选拔方式都抱有极深的不信任——人们不信任的不是“多元”，而是“多元背后谁说了算”。

在这种条件下，统一考试的方案浮了上来。它的优势不在理念上——没有人觉得一张卷子能考出一个人的全部潜质。它的优势在操作上：第一，它快——全国一张卷、一条分数线，可以在一两个月内完成千万人级的筛选；第二，它给全社会提供了一个所有人都能看见、都不得不承认的“客观”标准——分数。分数是一个数字。数字看起来不带人的偏见，不会被质疑为“你在偏袒自己人”。邓小平在1977年8月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这段话的措辞是温和的、开放的、留有余地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实际开启的，是一套以统一考试为唯一核心的分选机制。这不是因为决策者迷信考试，而是因为当时的条件下，除了统一考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案能同时顶住两股压力：顶住效率压力——快速筛出人才，填补断层；顶住公平压力——让全社会都承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从而让分选结果获得基本的社会接受。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细节需要被看见：决策者在那一刻的“选择”，并不是在“最优解”和“次优解”之间做抉择。他们是在“唯一可用的解”和“不可用的解”之间做抉择。推荐制不可用——公平压力顶不住。多元评价不可用——效率压力和时间压力顶不住，公平压力也顶不住（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它无法被信任）。统一考试是唯一剩下的那个。它不是被选中的，它是被逼出来的——是裂缝把所有其他方案都挤出去之后，唯一没有滑脱的东西。

这就是配位发生的历史方式：它不是在思想自由竞争中“获胜”，而是在裂缝的约束条件下被“逼成”了唯一解。决策者的作用不是“发明”配位物，而是在压力下直觉地识别出哪个方案能在裂缝里卡住——他们的选择范围已经被裂缝的形状严格限制。商鞅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当时的任何决策文件里，但商鞅逻辑的精髓——“不凭人智、只凭法度”、用一套最简单、最机械、最不容辩驳的公开标准来分选所有人——在1977年那个历史时刻，被裂缝从两千年的思想库存里重新翻了出来，配上了。

（四）标准化：唯一能同时从裂缝两侧受力的方案

经过上一节对配位发生过程的微观展开，现在可以更清晰地描述这道裂缝和它的配位物之间的结构关系。

商鞅的逻辑就在这个裂缝里被配上了。我们现在可以清晰地看见这道裂缝的形状：它的左侧是“识别真实差异”的要求，它的右侧是“不容辩驳的公平感”的要求。两股力方向相反，同时存在，不可通约，也不能单方面被压倒。任何想要配进这道裂缝的方案，都必须能同时从两侧受力——在左侧，它得有能力对人口进行筛选和排序，哪怕粗糙；在右侧，它得让被筛下去的人也找不到反驳的抓手，承认“这是公平的”。

标准化——用一把统一的尺子、一次统一的考试、一个统一的分数来分选所有人——是这个裂缝里唯一能同时从两侧受力的方案。在效率这一侧，它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谁更聪明/更努力”（尽管识别的是对标准化的适应力，不是真实的才智差异）。在公平这一侧，它提供了一个所有人都能看见、都承认的“同一把尺子”，让被筛下去的人也找不到反驳的把手——“分不够，是我不够努力，不是制度不公平”。

这个方案在识别真实差异上的粗糙，恰恰是它在维护公平感上的优势。考分是一个数字。数字看起来是“客观”的，不带人的主观判断，不会被质疑为“有偏见”。至于这个数字能不能真的反映一个人的才能——那是另一个问题。关键是，它让所有人都在表面上答应：好，就按这个来。

这里需要深挖一步：这个“答应”本身，是被什么样的心理机制支撑的？仅仅是“数字看起来客观”吗？不止。承认“分不够是我自己不够努力”，在心理上有三重功效：第一，它保留了希望——“下次我再努力就能赢”，而如果承认“制度不公平”，就等于承认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没用，那个心理后果比承认自己暂时失败要痛苦得多；第二，它维护了自尊——输给一个非人格化的标准（分数）比输给另一个人的主观判断要容易接受，因为前者不涉及“你这个人不行”的人格否定；第三，它避免了认知失调——你已经在这个赛道里跑了那么多年，付出了那么多，如果承认赛道本身不公平，你就必须面对“我过去的付出被浪费了”这个更难承受的事实。这三重心理机制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自我说服闭环：被筛下的人不仅不质疑标准化的公平性，反而会主动维护它，因为不维护它的代价——在心理层面——比维护它更高。

这三重机制并非本文首次指认，必须交代来源。约斯特与巴纳吉的系统正当化理论（Jost & Banaji, 1994）已经论证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处境最不利的群体，往往对使其不利的制度表现出最强的辩护倾向，因为承认制度不义所带来的心理代价，高于承认自身不足。桑德尔（Sandel, 2020）则从优绩制的角度指出，一套越是被认为公平的筛选机制，就越会把失败的全部责任压到失败者自己身上，从而把制度性的不平等转译为个人的羞耻。本文所补的只有一层：正因为被筛下者会主动维护配位物，配位物的扣力才不只来自制度的强迫，也来自被筛下者自己每天在心里完成的那一次自我说服——扣力有一半是从裂缝的公平侧、由承受者亲手拧紧的。

商鞅“壹民”的精髓，从来不只是“把人往一个方向上拧”，而是在拧的过程中，用一个最简单的、不容辩驳的量产指标——耕战：打了多少粮、斩了多少首级——取代一切复杂的、带有人的判断的评估。这就是《商君书》所谓君主不用“知人”而只用“知法”的深层原因：知人是复杂的判断，容易引发争议、猜忌、朋党；知法是机械的计量，像一杆秤——公正、无情、不容争辩。当代中国的高考和绩效主义，与商鞅在这个机制层面的共振，不是任何人有意识地“继承商鞅思想”的结果。它是一次配位：社会在“效率-公平”的巨大张力下，在已有的思想库存里搜寻——什么样的既有方案能用一

个最简单的、所有人都挑不出理的标准，把千差万别的人统一地分成三六九等？商鞅逻辑恰好就是这么个东西。它被配上了。

（五）裂缝与配位物的回塑：从“配位”到“共构”

在正式给出“配位”这个命名之前，还有一笔必须追问的账。此前的分析隐然设定了一个时序：先有一道“效率-公平”的裂缝，然后商鞅的标准化逻辑被找来塞进去。但上一节的历史还原已经初步表明，裂缝本身并不是先于配位物而完整存在的——它是在配位物被架上的过程中，才逐步清晰化、命名化、并被全社会所感知的。

现在把这一笔推进到更深一层。配位物不只是被动地被裂缝选中——它一旦被架上，就会反过来重塑裂缝的边界感知、话语表述和体感强度。标准化筛选不是简单地“配进”了一个现成的公平-效率裂缝，它在长期运作中教会了所有人用“一把尺子=公平”这个等式来感知公平。这就意味着，“公平压力”本身不是一个先于配位过程而独立存在的不变量——它在配位完成之后，被配位物深度强化了。

近年来一些地方尝试推行综合素质评价，遭遇的最激烈的阻力，恰恰来自那些在标准化评价中并不占优势的普通家庭。他们担心，一旦引入人的主观判断，有资源的家庭就会通过关系网绕过规则的约束。他们对“公平”的体感，已经被标准化筛选塑造成了“只有数字不会骗人”。这把尺子一旦被抽走，人们甚至不知道“公平”应该长什么样。

这就是回塑的运作方式。标准化筛选在裂缝中运行了四十多年，它不只是在裂缝里卡着——它已经和裂缝长在一起了。裂缝和配位物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配位”——裂缝挑选配位物——深化到了“共构”：配位物重塑了裂缝的感知，裂缝因此变得更依赖配位物，配位物因此更难被拔除。

回塑的层面不止认知。在制度层面，标准化筛选催生了整个培训产业、学区房经济、备考产业链。这些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本身就成为了维持裂缝的新增力量——他们不是标准化筛选的设计者，但他们是标准化筛选的既得利益者，任何试图松动标准化的改革都会遭遇来自这些集团的有形或无形的阻力。在身体和心理层面，长年在标准化的规训下，一个人的注意力结构、自我评价方式、对时间的使用习惯都被重塑了——他从小学开始就被训练成“一切为考试服务”，他的身体记住了“只有被评分的努力才算努力”，他的自我价值感绑定在排名和分数上。这种身体层面的规训，比观念层面的认同更难松动——你可以在观念上批判标准化，但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它。你知道不用那么焦虑，但你的身体不知道。

浙江选考改革的一段经历，可以更直观地展示这种“共构”的深度。浙江自2014年起推行“七选三”的选考制度，允许学生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自己擅长的科目。改革的初衷，正是打破“一把尺子量所有人”的格局。但在实际运行中，一个改革者未曾预料的机制迅速显形：由于选考实行等级赋分，而物理选考者中优秀学生高度密集，中等程度的学生一旦选考物理，赋分反而吃亏。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逃离物理”——2017年首次选考之后，物理选考人数的下滑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反应的逻辑完全合乎理性：既然赋分是相对的，那么“选哪一科”就不再是“我擅长什么”的问题，而是“哪一科的竞争者更弱”的问题。多元选择一旦进入一套仍以排序为唯一结算方式的机制，它就不会产生多元，只会产生对赛道的重新计算。更值得注意的是纠偏的方向。2018年1月，浙江省公布选考科目保障

机制，为物理设定六万五千人的保障基数：当实际选考人数低于这个基数时，按基数进行赋分。这是一次典型的回塑显形——为了保住“多元选择”，主管部门不得不再引入一个新的统一数字来托底。每一次多元化的尝试所遭遇的，都不是有人在维护商鞅，而是整套机制只认得用数字去解决数字所制造的问题。这才是共构最深的运作：裂缝已经被配位物养得只认这一种语言了。

（六）配位的不可还原校验

在做出了上述追问之后，现在可以给出“配位”这个概念的正式命名了。上述分析展示了一种机制：一个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承受着某些无法消除的结构性张力——两股或多股对冲的力同时存在、不可通约、又无法单方面压过对方。这个张力张开了一个裂缝。裂缝有形状——它张开的角度、承受的压强、两侧各自需要的支撑力的方向。社会需要找东西把这个裂缝暂时撑住、不让它当场撕裂。它会在已有的思想库存里搜寻——什么样的既有思想，它的结构恰好能同时从裂缝的两侧受力，能在其中卡住而不滑脱？找到，就配上去。一次临时的稳定得以完成。这种机制，本文称之为**配位**。

配位的核心特征在于：配位物不是因为它“正确”、“深刻”而被选中的——它是在结构张力给定的条件下，所有可用方案中恰好能配上的那一个。它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它是最能配的。配位一旦完成，社会就可以继续运转，不必每时每刻都直面那个裂缝。配位物的功能不是解决矛盾，而是让矛盾不被看见。

现在对这个概念做一个严格的不可还原校验。“配位”能不能被已有学科中的“路径依赖”、“制度化”、“合法性机制”等概念1:1替换？

“路径依赖”解释的是为什么一项制度一旦建立就很难改变——因为改变的成本太高。它可以解释标准化筛选为什么在已经建立之后难以被废除。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一开始，标准化筛选取代了此前的选拔方式。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那个历史节点上，路径还没有形成，成本还没有累积——路径依赖无法解释路径的起点。而配位要捕捉的，正是在那个起点上裂缝对配位物的结构性选择。更重要的是，路径依赖不处理“回塑”——制度对行动者偏好的反向塑造——这个维度。配位则将回塑作为核心机制之一。

“制度化”解释的是一套规则如何通过非人格化的约束来规制个体行为，以及为什么这些规则一旦被嵌入更大的制度网络之后就具有了自我维持的惯性。它可以解释标准化筛选为什么年复一年地稳定运转。但它解释不了制度被绷紧或放松的时机——为什么在某些年份（比如社会焦虑高涨、公平争议激烈的年份），标准化会被格外强调，甚至加码？而在另一些年份（比如经济增长快、机会多、社会整体情绪相对宽松的年份），它似乎又被松动了一点？比如，在高校扩招的年代（1999年以后），高考的“独木桥”压力在表面上有所缓解，标准化筛选的紧张度似乎略有下降；而在经济下行、就业压力陡增的年代，标准化筛选又被空前加固——因为每一分都变得更加“要命”了。制度化可以解释标准化为什么一直在那里，但解释不了它为什么有时绷紧、有时稍稍放松。配位可以给出解释：裂缝张开的强度在波动，配位物被绷紧或放松的程度随之波动。

“合法性机制”——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中强调组织为获得社会认可而采纳某种制度形式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标准化筛选被宣称为“公平”：因为它符合社会对“公平”的规范性期待。但它解释

不了为什么这种“公平”话语具有如此强大的动员力——能让被筛下去的人也承认“这是公平的”。合法性机制通常分析的是组织层面的策略性采纳，而不是大规模个体层面的深度内化。配位则在第三节详细展开了被筛下者“主动维护公平”的三重心理机制——保留希望、维护自尊、避免认知失调——揭示了“承认公平”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一种主动的自我说服。这个层面的分析，是合法性机制没有触及的。

配位捕捉到的，是上述概念都没有专门处理的那个层面：这不是制度惯性，不是路径依赖，不是合法性策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裂缝（两股对冲的、不可通约的力同时存在），和一个恰好能在这个裂缝中卡住不滑脱的旧思想方案，两者之间的一次“配准”。它不是“制度在运转”，而是“裂缝在寻找配位物”；它不是“人们对标准化产生了依赖”，而是“标准化恰好同时满足了两股对冲力量各自的最低要求，因此无可替代”。更重要的是，配位物一旦被架上，还会反过来重塑裂缝的边界感知和体感强度——裂缝和配位物之间是动态互生的，而不是单向的功能满足。这个互生的维度，是路径依赖、制度化和合法性机制都没有触及的。只要这个裂缝还在，标准化就不会退场——不是因为人们对它有信念，而是因为没有另一个配位物能同时从两侧受力。

用配位看商鞅，看到了什么不用配位就看不到的东西？最凝缩的一笔是：**标准化筛选不是“被历史选中的制度”，而是“被裂缝卡住而无法脱落的方案”**。前者暗示了一种主动的、有方向的历史选择；后者揭示的却是一个被动的事实——标准化之所以一直在那里，不是因为它被选中了，而是因为它滑不出去。裂缝的两侧把它夹住了。而且它已经在裂缝里待了四十多年，和裂缝长在了一起——它不仅是被夹住的，它已经把夹住它的那两侧的体感重塑了一遍。这个“夹住+长在一起”的双重体感，是路径依赖、制度化、合法性机制都无法传达的——它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件事在发生之后很难改变，但解释不了那个“只有它能卡在裂缝里、别的东西都卡不住”的结构性排他性，以及配位物长期运作后对裂缝的反向塑造。

三、心学在另一种裂缝中的配位

（一）另一种裂缝：“功利”与“意义”的拉锯

以上论证了商鞅逻辑在当代分选机制中的持久在场，不是因为它被人信奉，而是因为它在“效率-公平”的结构裂缝中被配上了。那么王阳明呢？

此前已有研究指出，当代心学的传播被架在“个体救赎期盼”之上——功利主义的赛道把人驱赶得疲惫不堪，传统道德话语空心化，人卡在中间，“既不愿意被功利主义吞掉，又找不到能让自己站稳的精神支点”。王阳明提供了一条看起来极顺滑的路：不用出家、不用皈依、不用改变职业和收入，只要“回到自己的心”，就能找到安顿。心学因此成为中产精神消费市场上的热销品。这一机制此前被描述为“找药式”——消费者自己先得觉得“精神上缺了什么”，然后主动去找药；药能不能治病不是关键，关键是找药这个动作本身让人获得了“我在治病”的叙事，从而可以在功利赛道上继续跑而不必面对“我为什么还在跑”的追问。

这个分析是结实的。本文的工作不在推翻它，而在往前推一步，问：为什么偏偏是王阳明被架上那个位置？他是不是也被某一道裂缝配取了？

当代个体承受的心理张力，不是简单的“太累了想歇歇”。它是两股对冲的力同时作用在同一个人身上：一股是功利逻辑——你必须在赛道上跑，必须把时间、精力、聪明兑换为可量化的竞争优势，否则你就出局；另一股是意义追问——你这么跑到底是为了什么？跑到了又能怎样？你活着就只是为了跑吗？这两股力方向相反：功利逻辑要求你不断地把注意力向外投注到竞争中，意义追问要求你停下来向内审视自己的生活目的。它们不能通约，但也不允许单方面被压倒——压倒了功利逻辑，你在现实竞争中出局；压倒了意义追问，你在精神上面对虚无。

这就是一个裂在个体内心深处的裂缝：“向外跑”与“向内看”二力对冲，谁也不能取代谁。这个裂缝本身也是被张力发生出来的——不是个体先有了一个叫做“意义匮乏”的病症然后去找心学，而是在功利赛道的驱赶与意义追问的拉扯之间，一种“我需要被安顿”的自我感知被逼了出来。这个被逼出来的感知，在心学中找到了一个恰好能配上的结构。

（二）心学为什么被配上了

心学有一个独特的结构，能同时从裂缝的两侧受力。它向内——告诉你一切答案都在心里，不用外求，这迎合了意义追问；它向外——强调“事上磨练”，不是让你出家避世，而是让你在做的每一件事里磨练那颗心，这迎合了功利逻辑对“你还是得跑”的要求。“知行合一”和“事上磨练”，把两股对冲的力拧在了一句话里：不是让你不跑，是让你跑得“内心宁静”、“不焦虑”、“有觉知”地跑。这简直是配位的完美范例——王阳明的心学恰好有一侧能顶住“我要安顿内心”的需求，另一侧能顶住“我还是得在现实里继续跑”的需求，两股力同时被接收、被容纳在一套话语里，个体因此暂时不用面对二者之间的真实矛盾。

一个具体的微观场景可以更清晰地展示这种配位的运作。一位在北京金融行业工作的中层管理者，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分享了自己阅读《传习录》的体验：“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想翻翻，翻完就觉得自己不那么焦虑了。不是说事情变少了，就是心态好了——反正该做的还是得做，但做的时候不那么抵触了。”他自己概括心学对他的意义：“它让我在忙的时候能保持一种‘出离心’，又不至于真的出家。”

这段话极为清晰地展示了配位是如何在个体心理层面运作的。他从心学中实际取用的是“事上磨练”而非“克己”——不是改变自己拼命工作的生活结构，而是在不改变结构的前提下获得一种“心态好了”的体感。他对心学的使用，恰恰是从裂缝的两侧同时吸取了养分：“该做的还是得做”（功利逻辑被接纳），“不那么抵触了”（意义追问得到了安抚）。他之所以不是去读“怎样成为更好的自己”之类的励志书，也不是去读佛经，而是去读《传习录》——恰好是因为心学在他直接可及的精神产品中，是唯一能同时提供“安顿内心”和“不耽误你继续跑”这两样东西的。别的精神产品往往只能提供一样：纯心理安抚类的不够硬，纯励志类比他还累，宗教类的门槛太高。心学恰好有一个“在事上磨练”的说法，让他可以合理化自己的继续奔跑——他不是功利竞赛中挣扎，他是在“磨练”——这个叙事本身就具有强大的配位力。

但是，这里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必须在这一刻被拉出来正视：**为什么是心学，而不是别的什么本土话语？** 比如，为什么不是朱子学的“格物致知”？朱子学同样强调在日常事物中磨炼，同样可以容纳“你还是得做你该做的事”。答案在于裂缝的形状对配位物结构的特殊要求。这道裂缝的个体心理层面，有一个朱子学无法满足的特殊需求：它要求配位物能够提供一种“向内求即可得”的即时安抚——不需要先“格尽天下之物”才能豁然贯通，而是当下、此刻、一回身就能感受到“心即理”的安顿。朱子学的“格物”是一条漫长的、外向的认知之路，它不适合充当“即时止痛药”。而心学的“致良知”提供的是一个极为便捷的入口：你不用改变任何外部条件，只需要“回到自己的心”，安顿就在那里。这个结构的差异——心学的“向内即时可得”vs朱子学的“向外渐进积累”——决定了在“功利-意义”这道要求即时安抚的心理裂缝中，心学比朱子学更配。这不是说心学在思想品质上“优于”朱子学，而是说在当前这道裂缝的形状下，心学的结构恰好切中了裂缝两侧同时受力的那个点，而朱子学的结构偏了一侧。这就是配位的逻辑：裂缝的形状决定了哪种结构的配位物更有竞争力。

（三）配位的脆弱：为什么这个位不稳

但配位的稳定性取决于一个关键条件：配位物自身有没有内在的抵抗被稀释的硬度。

商鞅所配上的裂缝是结构性的——它嵌在分选机制、教育资源分配、阶层流动通道这些硬制度里。一个人可以不认同标准化，但他无法单方面退出这个机制——除非他不参加高考、不求体制内的职位。结构的硬度保证了配位的强迫性：配位物不是因为你喜欢它而在那里，而是因为你退不出去所以它一直在那里。

心学所配上的裂缝是心理性的、个体性的。它以“精神消费品”的形态进入个体的书架和朋友圈。一个人可以选择把它吃进去，也可以选择不吃；吃了觉得没效，可以换一味药——正念冥想、禅修、积极心理学、某个网红的情绪课程。这里没有任何强迫性。配位物在心理裂缝中的卡力，全凭它自己有没有一个不能轻易被跳过、不能轻易被替代的硬核。

心学的硬核是什么？是“克己”。王阳明从来不只是在安慰人——他要求人在每一件事上诚实地反省自己的私欲，然后克掉它。这是有痛感的。它意味着你可能需要承认自己一直以来的某种活法是错的；它意味着你可能需要让渡一部分现实利益——比如，主动放慢在功利赛道上的奔跑速度，重新定义什么是“够好了”，把时间和精力投注到那些没有外部评价标准、却让自己内心感到充实的事情上。这个要求是硬的。

但问题在于，王阳明在心学里对“克己”的设计，不是被锁死的。你可以跳过去，而跳过之后剩下的话——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依旧悦耳，依旧能让人产生“我在修行”的满足感。心学自身的结构中，本来就有一个可以被打开的口子：那个“克”字从来不是制度化的、被外部监督强制执行的门槛，它完全依赖个体的诚实和勇气来兑现。而诚实和勇气，恰好是最不可强制、最不可程序化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心学在心理裂缝中的配位，随时可以被消费者自己偷偷松扣——他可以只取让他舒服的那一半（“致良知”的悦耳），而悄悄绕开让他不舒服的那一半（“克己”的痛感）。配位物本身的硬度不够，它就没法在裂缝中长期卡住。

这里必须回应一个最尖锐的质疑：你凭什么说那些人在绕开“克己”？这会不会只是你的推理而非事实？王阳明自己的设计里，“克己”是硬核——也许那些当代的读者就是日常在克己，只是克己的形态你看不见？

这个质疑有两种回应方式。一种是经验的、可复制的。在目前主流知识付费平台上心学相关课程的文案中，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关键词频率分析。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内心强大”、“不焦虑”、“找到力量”、“活得通透”——这些词对应的是裂缝的“安抚”一侧。而“反省私欲”、“克掉习气”、“让渡利益”这些对应“克己”硬核的词，几乎从不出现。市场比学者更敏锐地识别出了消费者对心学的需求结构——不是出版商和课程设计者在主动阉割心学，而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供给端只是在回应需求。当“不焦虑”的点击率百倍于“克掉习气”时，课程文案的措辞自然会向“不焦虑”倾斜。这不是我的臆测——这是市场在用真金白银做的选择，它揭示了裂缝所需要的配位面到底是什么。

另一种是反例的。确实存在一小群人，他们以“克己”为核心实践心学，并因此在生活方式上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渡——比如，有企业主在深度阅读王阳明之后，主动缩减了公司的规模，不再追求上市，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讲学和公益；有职业经理人在中年之后放弃了晋升竞争，回到家乡办了一个小书院，带着一群孩子读经典、做农活。这些案例是真实的，每一个都可以被查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人数规模有多小，他们的阶层分布有多集中。这些“硬核实践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已经完成了财富积累、社会地位相对稳固、有充足余裕选择“退出”的阶层。他们不是“在裂缝中被配位”的典型——他们恰恰是那些已经从裂缝里走出来的人。他们的存在，反过来说明了“普遍配位”中的脆弱性：对绝大多数还在裂缝中挣扎的个体而言，心学只能以被软化的、绕过痛感的形态被消费，因为硬核的克己实践要求个体承受巨大的现实代价，而裂缝中的大多数人不具备承受这个代价的条件。正是因为这个对比的存在，所谓“心学的精神消费”才成其为一个社会规模的现象——大多数人需要的是裂缝的临时支撑，而不是从裂缝中彻底走出来。

（四）“侧面激活”≠“回归本质”

这个硬度差异，在历史上有一个清晰的对照。王阳明在世时，不只是一个坐在书院里讲学的哲学家——他在南赣剿匪、平定宁王之乱后，在地方上推行乡约、兴办社学、移风易俗。这些实践不是“精神按摩”，是硬核的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造。心学在那个时代被激活的侧面，恰恰是今天被搁在暗处的那一面：“克己-行动”的硬核。晚明的裂缝是士风与制度的僵化，心学的“解放”侧面被配上去——泰州学派后来把它推进为平民讲学和社会实践运动。清初的裂缝是王朝对士林的整肃，心学的“空谈”侧面被揪出来批判。当代的裂缝是功利与意义的脱节，心学的“内心安顿”侧面被架上精神消费的货架。同一个心学，同等的内在结构，在不同的裂缝里被激活了完全不同的侧面。

这里必须做一笔关键的防误读处理。上述“侧面激活”的论述，绝不是在暗示“克己实践才是心学的本质，精神安抚是它的堕落”。这不是本文的立场。一个配位物哪一个侧面被裂缝照亮，不取决于它自身的内部结构哪个更“真”，而取决于裂缝的形状需要它提供哪一类的支撑力。裂缝变了，被照亮的侧面就变了——没有哪一个侧面是配位物的“永恒本质”。晚明的裂缝需要解放，解放侧面就被照亮；当代的裂缝需要安抚，安抚侧面就被照亮。这两个侧面都是心学自身结构中真实存在的部分，

没有哪个更“真”、哪个更“假”。它们在价值上也没有高下之分——配位的逻辑不关心价值排序，只关心结构匹配。

如果你一定要追问“心学的本质是什么”，本文的回答是：心学没有一个先于裂缝而存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本质”。它的所谓“本质”，是在每一次被不同裂缝配取时，被不同的侧面激活所结算出来的——而这一次的结算，和上一次、下一次都可能不同。不是裂缝遮蔽了一个永恒的心学本质，而是裂缝在不断地重新定义心学“是什么”。

当下，心学在心理裂缝中的配位之所以脆弱，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是软弱的”，而是因为当前这道裂缝根本不需要它硬的那一面——或者更准确地说：裂缝需要的是“同时从两侧受力”的方案，而个体在心理层面上最省力的做法，就是只取配位物中悦耳的那一侧，绕开痛感的那一侧。下一次焦虑涌上来，消费者可能还会来找心学，也可能发现别的东西更管用——更低成本、更不费事、更悦耳。心学当前的不可替代性，不是因为它比别的药更止痛，而是因为它比其他止痛药多了一味“不耽误你继续跑”的成分。但这个优势是脆弱的：一旦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同样能同时供应“安抚+不耽误跑”的精神产品，心学随时可以被替换。

四、配位的“扣力”比较

（一）结构配位与心理配位的不同命运

把商鞅和王阳明放在“配位”这个框架里看，二者的命运差异就不难预判了。关键不在于谁的思想更“正确”或更“深刻”，而在于他们所配上的那个裂缝，在结构上的持续性有多强，以及各自对裂缝的回塑能力有多强。

为了方便后续的分析，这里先做一个术语上的区分。商鞅所配上的裂缝是结构性的——它嵌在分选机制、教育资源分配、阶层流动通道这些硬制度里。个体无法单方面退出。这种配位，本文称之为**结构配位**。心学所配上的裂缝是心理性的、个体性的——它以精神消费品的形态进入个体的书架和朋友圈。个体可以选择消费、也可以不消费。这种配位，本文称之为**心理配位**。结构配位的扣力来自制度的强迫性和裂缝的持续性；心理配位的扣力来自配位物自身的硬度和个体对裂缝的自愿感知。两者在运作机制上同构——都是裂缝在搜寻配位物，都是配位物在裂缝中同时从两侧受力——但在扣力的来源和持久性上迥异。

商鞅所处的结构配位中，“公平”与“效率”的二律背反是当代中国在追赶阶段绕不开的结构性张力。只要国家还在追赶，效率压力就存在；只要“以平等为核心的正当性话语”仍然有效，公平压力就存在。更关键的是，如第二节所论证的，配位物本身已经反过来重塑了社会对“公平”的体感——标准化筛选跑了几十年，已经教会了全社会用“同一把尺子”来感知公平；与此同时，它催生了整个备考产业链、学区房经济，这些利益集团本身已经成为维持裂缝的新增力量；它还规训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体——他们的注意力结构、自我评价方式、对时间的使用习惯，都已经被标准化深深地塑造了。回塑的层面是立体的：认知、制度、身体。这就意味着，裂缝不仅在结构上持续，而且被配位物在多

个层面上加固了。即使将来公平压力的某些原始动因减弱，标准化所塑造的那套“公平=统一标准”的集体直觉、那条缠绕在标准化上的利益链、那些已经被规训进身体里的竞争习惯——三者本身就会成为维持裂缝的新力量。商鞅逻辑在它的裂缝里，不仅是被卡住的，而且已经和裂缝长在一起了——你把配位物往外拔，社会对公平的感知可能会先于裂缝而崩塌，培训机构会率先反弹，被规训的身体会不知道怎么做选择——而这些崩塌、反弹和茫然的前景本身，反过来成为继续保留配位物的最有力的理由。这才是商鞅最难被替换的根本原因：它已经不只是一个临时的配位物了——经过四十多年的运作，它和裂缝之间的关系从“配位”深化到了“共构”。

心学所处的心理配位中，“功利”与“意义”的拉锯只对特定阶层、特定人生阶段的人张开。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通常没有余裕读王阳明；那些在功利赛道上跑得顺风顺水、没有反身追问自己“这么跑是为了什么”的人，也不需要读王阳明。它的张开依赖个体的苦痛自觉，它的闭合可能只需要个体找到另一种更低成本的精神安慰剂。更重要的是，心学在这个裂缝中还没有完成任何类似于商鞅那样的“回塑”——它没有反过来重塑个体对“意义”的感知方式，没有让足够多的人觉得“离开心学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安顿了”。它被配上的年头还不够长，它占据的精神市场份额还不够大，它自身的硬度也不够支撑它完成那种回塑。因此，它的配位是轻的：裂缝在，配位在；裂缝收，配位就松。它在裂缝中没有任何强迫性——一个人可以在今晚因为焦虑而翻开《传习录》，也可以在明早刷了一个小时的短视频后把书合上，下个月改听一个讲佛学的播客。

（二）扣力差异的根源：裂缝持续度、替代可得性与配位物的回塑能力

配位的持久性，不取决于配位物自身的品质，而取决于配位的“扣力”。扣力是裂缝对配位物的咬合力与配位物自身硬度的乘积。更精确地说，扣力由三个要素共同决定。

第一个要素是裂缝的持续强度。公平-效率裂缝的持续期，显然比个体对意义追问的持续期更长、更稳定。一个社会可以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持续承受公平-效率的压力；但一个个体的意义追问，往往只在人生的特定阶段——中年危机、职业倦怠、重大挫折——集中爆发，过后可能就平复了。未必是因为找到了答案，而是因为注意力被新的事务占据、焦虑感被新的快感遮盖。

第二个要素是替代配位物的可得性。在公平-效率的裂缝中，目前还没有任何替代方案能像标准化这样，同时满足两股对冲力量的最低要求。多元化评价体系虽然已经在教育政策的话语层面获得了合法性，但它在实践中仍然无法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一旦引入人的主观判断——面试、推荐信、综合素质评价——公平的争议就会立刻爆发。“凭什么你觉得他的素质比我高？你的判断标准是不是在偏袒有资源的那群人？”标准化之所以无可替代，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它是唯一能让所有人都暂时闭嘴的方案。而在功利-意义裂缝中，心学的替代品大量存在。正念冥想、哲学咨询、积极心理学、各种“找到你的人生使命”类的工作坊——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可以同时提供“安抚+不耽误你继续跑”的功能组合。心学只是在这个细分市场上暂时凭借文本的经典性和文化身份的亲近感占据了品牌优势，但这个优势不是结构性的，是市场性的。

第三个要素——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是配位物对裂缝的回塑能力。这一点在上一节已经展开了：商鞅的标准化筛选不仅被配进了裂缝，还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在认知、制度、身体三个层面反

过来重塑了全社会对“公平”的感知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与身体习惯，从而深度加固了裂缝自身。而心学在个体心理裂缝中的回塑能力微乎其微——它没能在足够多的人心中建立起“离开心学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意义”的那种深度绑定。回塑能力的差异，在根源上又回到配位物自身结构的硬度：标准化是制度性的、有强迫性的——不管你认同不认同，你都得照着做，照做了之后你的体感就被它改了；而且它周围的利益集团和它规训出来的身体习惯，会主动抵抗任何松动的尝试。心学的“克己”是自愿性的、可以被跳过的——大多数人只取悦耳的那一半，绕开了痛感的那一半，所以心学对大多数人而言始终是“一件可以脱掉的外套”，而不是“一副长在肉里的骨架”。改不了体感的配位物，在裂缝压力减弱时就会滑脱；能从认知、利益、身体三个层面同时改体感的配位物，会在裂缝自身开始合拢之后仍然长时间地留在那里——因为社会已经不习惯没有它的状态了。

（三）自觉与不自觉：配位的两个层面

这里有必要做一个概念上的澄清。“配位”一词在本文中先后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在商鞅的案例中，配位主要是结构性的、无意识的结构筛选——社会裂缝在已有的思想库存中搜寻，个体和决策者并不一定意识到他们正在“配取”商鞅。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策中，没有人说“让我们把商鞅的逻辑配进公平-效率裂缝”——决策者只是直觉地感到，在所有可行的方案里，统一考试是“最不坏”的那个。这个“最不坏”的体感，本身就是配位在历史瞬间的运作方式：它不是逻辑推演的结论，而是当事人在压力下做选择时，裂缝通过“把所有更好的方案都挤出去”来逼出唯一解的过程。决策者的作用不是“发明”配位物，而是在压力下直觉地识别出哪个方案能在裂缝里卡住——他们的选择范围已经被裂缝的形状严格限制。

在心学的案例中，配位则表现为另一种形态：个体在心理裂缝的压迫下，主动地在精神市场中搜寻能缓解焦虑的产品。他们在体感上觉得自己是在“主动选择”，但这种“主动”本身已经被裂缝塑形了——他们的可选范围，已经被裂缝的形状严格限制了。“必须同时满足‘安抚’和‘不耽误跑’”这个要求，不是他们按照某个理论推导出来的——是裂缝强加给他们的。他们试过纯安抚类的产品，发现“不耽误跑”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就又回来了。最终，他们选中心学，不是因为自由意志的偏好，而是在裂缝给定的限制条件下，心学是货架上最配的。

两个层面看似不同——一个是无意识的结构筛选，一个是有意识的个体选择——但它们在“裂缝限制可选范围、配位物的结构决定被选中的概率”这一机制上是统一的。二者的差异只在于运作的层面不同：结构层面的配位，筛选的机制嵌在制度运作中，个体的意识不参与其中；心理层面的配位，筛选的机制表现为个体在有限货架上的“主动选择”，但这种主动本身被裂缝塑形。

五、配位的边界与三种松动情景

（一）配位不是决定论

在进入情景推演之前，必须防住一个最可能的误读：配位不是在说“商鞅的命就是永远扣在结构裂缝上、永远退不掉”。配位分析的不是永恒的命运，而是**当前的扣力状态及其可能的松动条件**。

配位物在裂缝中卡住，不是一劳永逸的。裂缝本身会变化——两侧对冲力量的强弱对比会变；配位物自身也会被消耗——它长期被架在裂缝中承受巨大的张力，它的结构可能会从内部出现疲劳、裂纹、乃至断裂。更重要的是，替代配位物可能在某个历史时刻出现——不是因为它比旧配位物“更正确”，而是因为它能更好地从裂缝两侧同时受力。当一个新的配位物出现时，旧的会被顶出去，就像历史上察举制被九品中正制替换、九品中正制被科举制替换一样。

本节推演三种可能的松动情景。推演不是预测——它不承担承诺未来一定按哪种情景展开的责任。推演的价值在于暴露本文核心判断的边界与证伪条件。特别需要处理的一个张力是：第二节已经论证了配位物对裂缝的深度回塑——标准化筛选在认知、制度、身体三个层面重塑了裂缝的感知和社会的利益结构。如果回塑如此之深，那么松动所需的条件可能比初看起来要严苛得多。以下的情景推演将正视这个张力，并在回塑的框架下重新评估每一种松动情景的可信度。

（二）情景一：裂缝持续张开——商鞅不退，王阳明周期性涨落

如果“公平-效率”二律背反在未来半个世纪里仍然维持在当前的强度——国家仍然在追赶，平等正当性话语仍然有效，标准化筛选仍然是唯一能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取得临时平衡的方案——那么商鞅不会退场。它可能在局部更换一些形式（比如评价体系从“唯分数”调整得稍微多元一点），但只要那道裂缝还在，只要没有另一个配位物能把自己塞进去取代它，它就还在。而且，由于标准化已经深度回塑了全社会的公平感知、催生了庞大的利益产业链、规训了几代人的身体竞争习惯，裂缝即使开始合拢，配位物也不会立刻滑脱——社会已经不知道怎么用别的方式感知公平了，培训机构和学区房持有者会竭力抵抗，被规训的身体会不知道怎么做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改革政策提出了多元评价的目标，在落地的每一步都会遭遇巨大的社会阻力：阻力不是来自商鞅的逻辑，而是来自标准化筛选四十多年间在认知、利益、身体三个层面同时建立的那套互相锁定的“共构”结构。

心学在这种情景下的命运，大概率是维持现状：周期性地、在特定人群中作为精神配位物被使用。当社会整体焦虑高涨时，找药的人增多，王阳明的书热销；社会情绪转向娱乐化、低消耗快乐时，找药的人减少，心学的热潮退去。这种涨落是正常的——它不是心学自身的生命力在增长或衰退，而是它所配上的那个裂缝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张开的强度在变化。

（三）情景二：代际认知更替导致公平压力减弱——商鞅的松动

如果未来社会在某个阶段，公平压力显著减弱——不是因为“公平”不重要了，而是因为新一代人对“公平”的体感发生了变化——那么标准化筛选的配位就开始松动。

代际认知的更替是一个可能的关键变量。新一代年轻人成长在一个物质上相对不再匮乏的时代——他们从小被标准化训练塑造，但进入社会后发现自己只会做题、不会判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再像他们的父母那辈人一样感激“高考改变命运”，反而开始怨恨“高考浪费了我宝贵的青春”。这种怨恨目前还在零星爆发，谈不上系统性的反思；但当持这种认知的人在人口中累积到一定比例，他们对自己人生经验的集体表达，就可能构成公平压力的代际衰减：不是“公平”不重要了，而是“这套标准化所定义的公平”不再被新一代人无保留地承认了。

这里需要做一个轻度的理论标记。代际认知更替并非本文的新发现——曼海姆的世代理论早已分析了不同代际群体因经历了不同的历史事件而形成不同的“世代意识”。但本文所说的代际衰减，与曼海姆的进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曼海姆分析的是意识结构的转型——一代人共享的新经验如何取代旧经验的解释框架；而本文分析的是**结构张力对个体的抓力衰减**——不是新一代人“想清楚了标准化不好”，而是标准化对他们在体感上的强制性变弱了。他们从小经历标准化筛选，但不像父母那一代那样把这个经历体感为“唯一的出路”。当足够多的人不再觉得“必须参加这个游戏”，裂缝一侧的力就弱了——而这是发生在体感层面的，不是发生在观念层面的。抓力衰减不一定需要一代人形成清晰的“反标准化意识”——他们只需要在行动上不再把标准化当作不可退出的命运，配位就开始松动。

但是，回塑的深度给这个情景的可信度打了一个折扣。标准化筛选已经在身体层面规训了几代人——他们的注意力结构、对时间的使用习惯、自我评价的方式，都已经被标准化深深地塑造了。观念上的批判可能无法轻易穿透身体层面的惯性。一个在观念上批判标准化的人，在面临自己的孩子升学时，可能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最“稳妥”的标准化备考路径——因为他的身体比他的观念更信标准化。这意味着，代际衰减要真正达到“松动裂缝”的程度，需要的不只是新一代人的观念变化——它需要的是新一代人在身体层面找到了另一种组织注意力、评价自我、使用时间的方式，而这比观念转变要难得多。因此，本文对情景二的判断是谨慎的：它是可能的，但“回塑”的存在意味着它发生的时间尺度可能比初看起来要长得多。

（四）情景三：新的配位物出现——商鞅被替换

另一种松动商鞅的路径是：社会在维持“公平-效率”裂缝的同时，发明或接受了另一种全新的分选机制，它同样能同时从裂缝两侧受力，而且比标准化更精准、更公平、更不费事。商鞅就有可能被替换下来。

这个新的配位物长什么样，眼下无从预知。但它必须能同时满足两股力的最低要求：在效率侧，它能在大规模人口中精准地识别出个体差异；在公平侧，它必须有一套能让绝大多数被筛下去的人也承认“这不是在偏袒某些人”的公开透明标准。只要这两个要求被同时满足，标准化就有被替换的可能。商鞅的逻辑不会万岁，它的配位只在还没有更强的替代方案之前持续。

当旧配位物滑脱、新的尚未形成时，裂缝就可能直接裸露在社会表面。这个裸露状态意味着张力不再被配位物吸收，而是被社会直接承受——社会丧失了用统一标准裁判分配结果的体感，从而在每一次分选争议中直接承受矛盾的冲撞。这个压力既是风险，也是契机。它可以催生出当前思想库存里没有的新结构——不是“回归”某个被遗忘的原创思想，而是从裂缝本身的形状里长出从前没有的、能同时顶住两股力的新方案。

标准化筛选已经在中国运行了四十多年，它的回塑效应使得“找到新配位物”的要求变得极为苛刻。新的配位物不仅需要在结构上同时从裂缝两侧受力，还需要有足够长的运作时间来建立它自己的回塑——在认知层面重新教会社会“公平还可以长成这样”，在利益层面催生出新的受益群体来抵抗旧利益链的反扑，在身体层面重新规训新一代人的注意力结构和自我评价方式。这意味着，即使一个新的配位物在理论上已经出现，从它被引入到它真正取代旧配位物的位置，中间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

长的时间。旧配位物不会因为“更好的方案已经被发明”就自动退场——它已经在裂缝里长了四十年，拔掉它需要一段相当长的“共生”过渡期。这是配位理论区别于“技术替代”逻辑的关键：在技术领域，更好的技术可以快速取代旧技术；在结构配位领域，旧配位物已经和裂缝长在一起了，替代不是换一个工具，而是换一副社会的骨架——那个手术的时间尺度，不是年，是代。

（五）王阳明的证伪条件

如果上述任何一种松动情景没有出现——裂缝持续张开，商鞅继续配在标准化筛选的位置上——心学有可能迎来一次自我突破的机会吗？

本文此前对心学的判断是：在当前的配位上，它是脆弱的、可被替代的。这个判断的证伪条件在于：能否出现相当规模的人群——不是零星的特例，而是跨阶层的、可被观察为一种社会趋势的——把心学付诸硬核的克己实践，而不仅仅是拿它来缓解焦虑。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不是在读心学之后“觉得有道理”，而是在读心学之后真的在生活方式上做出了让渡——比如，主动放慢了在功利赛道上的奔跑速度，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够好了”，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注在那些没有外部评价标准、却让自己的内心感到充实的事情上。当这种让渡不是个别特例的偶发，而是可被识别为一种社会现象——比如，能够在某个城市或某个行业里观察到一个相当规模的群体的生活选择明显可以被描述为“受心学影响的克己实践”，并且这种实践不是封闭在某个小众圈子里的，而是跨阶层扩散的——那么本文对王阳明当前配位脆弱性的判断就被证伪了。到那一天，心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就不再是“被配上去的”精神配位物，而是靠自己站着的——它在个体心中的扣力，不再依赖裂缝的张开，而是依赖它自身的硬度。

六、与既有解释的对话

在给出了“配位”的完整逻辑之后，有必要把它放进既有的思想史方法论和更宽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去面对同行可能提出的质疑。本节做四笔对话。

（一）直面福柯：裂缝不是权力的另一种说法吗？

有一个本文必须正面面对的对手，在第一稿中被完全遗漏了。本文的“裂缝-配位”机制，与福柯的“权力-知识”（pouvoir-savoir）与“装置”（dispositif）之间，有明显的结构亲缘关系。福柯分析的正是一种权力策略如何不是被人“发明”的，而是从局部的、分散的实践中聚集而成；一种话语如何在特定的权力配置下被激活为真理。如果读者把本文的“裂缝”理解为“权力的结构性张力”，把“配位”理解为“装置对主体的捕获”，本文的论述还能不能被区分出来？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质疑。

本文的回答是：福柯和配位分析处理的是同一类现象的**不同侧面**，这两个侧面不可互相还原。

福柯的装置分析，重心在权力的毛细血管如何编织个体。装置是一套异质性的集合——制度、建筑、话语、法律、行政措施——它从局部的、分散的实践中聚集而成，然后反过来生产出特定类型的主

体。福柯要解释的是：权力如何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它生产知识、生产主体性、生产“正常”与“不正常”的边界。在他的分析中，装置是**主动编织**的——它通过持续的、弥散的、毛细血管式的运作，把个体纳入一张越来越密的网中。

配位分析的重心在另一个方向上。它关注的不是权力如何生产主体，而是结构裂缝的张力如何**迫使**一个现成的旧方案被反复激活。裂缝不是权力的策略——它是两股对冲的、不可通约的力之间撕开的一个缺口。社会寻找配位物，不是为了“编织”个体，而是为了把这个裂缝暂时撑住，不让张力撕裂社会的表层。配位物不是生产出来的——它是从已有的思想库存里被**翻出来**的。它之所以被翻出来，不是因为它能最有效地规训主体，而是因为它的结构恰好能同时从裂缝的两侧受力，能在其中卡住而不滑脱。

两者的区分可以凝缩如下：福柯分析的是**新装置如何被生产出来、并反过来生产新主体**——权力的生产性面向。配位分析的是**旧思想如何被裂缝从库存里翻出来、并反过来重塑裂缝的感知**——裂缝的选择性与配位物的回塑性。福柯的装置是新造的；配位的配位物是旧的。福柯的重心在权力对主体的主动塑造；配位的重心在裂缝对方案的被动筛选。

这个区分直接决定了两种分析给出的行动出路完全不同。福柯式的批判出路在于揭示权力的运作机制，让被规训的主体看见自己被编织的痕迹，从而松动权力的自然性。配位分析的出路在于识别裂缝的形状和配位物的扣力状态，追问“什么样的新结构能从裂缝里长出来”而不是“我们怎么从权力的网里挣脱出来”。前者是批判性的，后者是发生性的。两者不是替代关系——一个社会可以同时在被权力编织着、也在被裂缝逼着找配位物——但两副眼镜看到的東西不同，给出的行动方向也不同。一个读福柯的批判者会倾向于认为，标准化筛选是一套权力装置，它在生产“会考试的主体”；一个用配位看的人则会追问：在当前的裂缝条件下，如果我们拆除这套装置，裂缝会裸露成什么？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承受那个裸露？如果没有，新的配位物从哪里来？两种追问可以并存，但它们不在同一个分析层面。

（一之二）与多源流理论、文化工具箱与正当化秩序的对话

这是本文第一稿最严重的遗漏。以下三支文献，各自从不同方向占据了“配位”想要站的位置，必须逐一交代。

多源流理论。 金登（Kingdon, 1984）提出，政策过程中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各自独立漂流；政策方案并不是在问题出现之后才被发明出来的，它们早已漂浮在“政策原汤”里等待，只有当三流在某个“政策之窗”开启的时刻被耦合起来，一个方案才会被采纳。其更早的源头是科恩、马奇与奥尔森的垃圾桶模型（Cohen, March & Olsen, 1972）——“解决方案在寻找问题”。本文第二节对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构，从形态上看就是一个多源流案例：统一考试这个方案在思想库存里躺了一千多年，1977年的窗口把它捞了出来。这一层，金登已经说尽了，本文不主张新意。

差别在两处。其一，多源流理论的核心机制是耦合，且明确赋予“政策企业家”以能动作用——是某个人在窗口开启时把三条流拧到一起。而配位分析的核心机制是排除：不是有人把方案推上去，而是裂缝把其余方案全部挤了出去，剩下的那个被逼成了唯一解。1977年的决策者不是政策企业家，他

们是在一个已被压缩到只剩一个选项的集合里做“选择”。其二，也是更要紧的一处：多源流理论止于方案被采纳的那一刻，它不处理方案被采纳之后如何反过来改造问题本身的界定。而这正是本文“回塑”所要处理的。就此而言，比多源流更近的其实是皮尔森关于政策反馈的论述（Pierson, 1993）——制度一旦确立就会重塑利益格局与行动者的认知，从而使自身更难被更改，“结果变成了原因”。本文的“回塑”与之同构，本文所加的只是回塑的第三个层面（身体层面的规训），以及“社会已经不知道如何用别的方式感知公平”这一认知后果。

文化工具箱。 斯威德勒（Swidler, 1986）主张，文化不是决定目标的价值系统，而是一个由习惯、技能与风格构成的“工具箱”；行动者从中取用那些能支撑其行动策略的部件，并且在“未安定时期”，明确的意识形态会发挥更强的组织作用。“从思想库存里翻出恰好合用的那一件”这个意象，斯威德勒已经给出。本文与之的差别在于取用的主语：在斯威德勒那里，取用者是行动者，工具箱服务于行动者的策略；在本文这里，取用发生在行动者的意识之外——是结构张力在筛，而个体只是感到“别的都不行”。斯威德勒的工具箱解释了可用性，配位要解释的是排他性。

正当化的秩序与妥协装置。 与本文距离最近的，其实是博尔坦斯基与泰弗诺（Boltanski & Thévenot, 1991）。他们论证，社会中并存着若干套不可通约的“价值秩序”，而当两套秩序在同一场合同时提出要求时，行动者会诉诸一种“妥协装置”——一种能同时接受两套秩序各自的正当性、从而使争执暂时不必被裁决的安排。把“效率”与“公平”读作两套价值秩序，把标准化考试读作一个妥协装置，本文的核心结构就被这套理论基本覆盖了。本文对此不作辩解，只指出两点尚存的分工：其一，他们的分析场景是具体的争执现场，妥协装置是当事人可以援引、也可以放弃的资源；本文关心的则是一个妥协装置在数十年运行之后凝固为社会唯一的公平语法之后的状态——那时它已经不再是可以援引的资源，而是感知本身的形状。其二，妥协装置在他们那里是被建构出来的，而本文强调配位物是旧的、是从既有库存里被翻出来的——它的可信度恰恰来自它的年代，来自“历来如此”。这两点是否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命名，本文把判断权交给读者；但若不交代这三支文献，任何独立性主张都不成立。

（二）与斯金纳的“思想作为武器”

斯金纳已经做了非常精细的工作——分析政治思想如何在特定的论争语境中被当作武器来使用，而不是被当作自足的哲学体系来流传。读者可能会问：配位和“思想作为武器”之间有什么不同？

表面上看，两者都是强调“思想不是自足的”、“语境的作用很重要”。但有一个根本的区分不能混淆：斯金纳分析的是**有意识的论争行为**——作者在写作时是在主动地、策略性地调用思想资源来攻击对手或为自己正名。在他的分析中，作者是行动者，思想是被作者选用的工具。配位分析的却是**无意识的、结构性的配取**——不是某个人在策略性地“用”商鞅，而是社会裂缝本身在搜寻配位物，个体和制度是不自觉地卷进去的。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策者并没有说“我来引用商鞅”——他们只是在给定的压力下，选择了所有可行方案中最不坏的那一个。他们的选择范围已经被裂缝的形状严格限制了。配位捕捉的正是这种发生在行动者意识之外的、结构性的筛选过程。斯金纳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人在某本书里批判对手时引用了亚里士多德；但本文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在一个几亿人的社会里，一种

筛选逻辑可以无意识地、不自名地运行四十多年——这不是任何人的“论辩策略”，而是裂缝在挑配位物。

（三）与功能主义的区分

功能解释在社会科学的传统里有一个著名的缺陷：它用后果来解释原因。说“因为标准化维持了社会稳定，所以标准化被选中”——这会被质疑为倒果为因。配位分析是否只是功能主义的一种换皮？

必须明确回答：不是。功能解释的逻辑是：因为X有功能Y（维持稳定、满足需要），所以X存在。这个逻辑在社会科学中已经被反复批评——它预设了系统有一个事先存在的“需要”，而这个需要自动地召唤出了能满足它的机制。但历史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自动召唤。功能不是原因，功能是后果。

配位分析的逻辑是另一回事。它不承诺“系统有需要→需要被满足”。它说的是：在给定的结构张力下，可用的备选方案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集合里。不是因为标准化“有维持稳定的功能”所以它被选中——而是因为在已有的思想库存里，只有标准化恰好能同时从裂缝两侧受力；其他方案在这个特定裂缝中都卡不住。标准化被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满足了什么功能，而是因为在裂缝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它是唯一没有滑出去的东西。

这里需要做一个限定：本文批评的功能主义，指的是帕森斯式的强功能主义传统——那种预设了系统会自动选择“最优”方案来满足其功能需求的理论。后来的功能分析——比如G. A. 科恩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已经做了精细的修正，可以兼容“次优方案被选中”。本文的批评不针对这些修正后的版本。但即使是对修正后的功能分析而言，配位仍然有一个它们没有触及的维度：回塑。功能分析解释的是“X因为具有功能Y而被维持”，但它不解释X被维持之后如何反过来改变了Y的形态。配位分析的核心贡献之一，正是论证配位物在裂缝中长期运作之后，会反过来重塑裂缝自身的感知——不是裂缝在维持配位物，而是配位物在改造裂缝。这个回塑的维度，是功能主义传统（无论强功能主义还是修正后的版本）都没有专门处理的。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需要辨清。功能主义通常隐含着—一个优化预设：系统会倾向于选择“最优”的方案来满足其功能需求。配位分析恰恰相反——它讲的根本不是优化，而是“最不坏却唯一”。标准化不是在所有可能的方案中最好的那个——在识别真实才智的精准度上，它远不如一些更复杂的评估方式。但它是在当前的公平压力下唯一不会立刻引发合法性危机的方案。它不是最优解，它是唯一可用的解。这个“最不坏却唯一”的位置，是配位分析区别于功能主义的要害：功能主义说的是“系统需要它，所以它被创造出来”；配位说的是“裂缝把别的方案都挤出去了，只剩下它，所以它一直在那里”。一个是功能需要召唤了配位物；一个是裂缝约束排除了其他选项，剩下的那个被“逼成”了配位物。

（四）与“内在理路”和“嵌入性”的对话

思想史学界另有一脉重要的进路，强调思想自身逻辑的内在展开——“内在理路”或观念史的进路。这派观点会质疑：你把思想完全处理为“被裂缝挑选的配位物”，是否完全忽略了思想内容自身的品质？心学在当代的流行，难道不和《传习录》文本本身的可阐释性有关吗？难道不和心学对“个

体心性”的关注与现代个体观念的某些亲和性有关吗？如果裂缝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那为什么在同一个裂缝下，不同文化中对等的裂缝配上了完全不同的思想——为什么中国人的功利-意义裂缝配上了王阳明，而西方人可能配上了斯多葛主义或存在主义？

这个质疑是严肃的。本文的回答既不回避它，也不依附于“内在理路”派。

思想的自身结构确实有重要性——它决定了配位物的“可配性”。不是任何思想都能配进任何裂缝。裂缝的形状——它两侧对冲力量的方向、强度、各自的支撑需求——严格限制了什么样结构的思想能配进去。但在这个限制范围内，不同传统的裂缝可能从各自的思想库存中配取了不同但同构的配位物。西方中产在面对类似的“功利vs意义”裂缝时，配上了斯多葛主义的“不动心”和“只关注你能控制的事”——它同样能同时从两侧受力：一边安抚内心，一边不耽误你在罗马帝国（或现代企业）里继续履行你的职责。中国的裂缝配上了王阳明的“事上磨练”，配位机制相同，配位物的思想来源不同。这说明裂缝决定了配位的发生、决定了哪种结构的思想能配进来，但它并不规定配位物必须来自哪个传统。思想的自身结构，决定了它在裂缝可选范围内的竞争力——为什么是心学而不是某种别的本土话语被选中，为什么它在当前的裂缝中比朱子学更配——这些都是思想自身的品质在起作用。内在理路告诉我们心学从王阳明到王龙溪到刘宗周是怎么一步一步推进的。这个解释在其有效范围内是成立的。但内在理路解释不了一个现象：心学在五百年后突然被一群从未完整读过《王阳明全集》、只读过几段语录的中产白领当作精神配位物来使用。解释这个现象，需要的不再是思想自身的演进逻辑，而是当代社会的裂缝形状——什么样的裂缝，需要一个恰好能同时顶住“我要安顿”和“我还得跑”这两股力的既有话语？在这个追问面前，内在理路是失语的。两个解释层面各自的有效范围不同。在“心学从王阳明到刘宗周的思想推进”这个问题上，内在理路是必要的；在“心学为什么在五百年后被一群不读原著的人重新拾起”这个问题上，配位是必要的。它们不必互相否定，但它们各自的有效边界是清晰的。

另一个需要对话的概念是“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中强调经济行动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理论。这个理论能否覆盖配位所要解释的现象？不能。嵌入性理论的重心在于行动者如何主动地、策略性地将自己的行动嵌入到社会网络中以获取资源或正当性。它的行动者是有能动性的——企业主动嵌入社会网络来获得信任，个体主动嵌入关系网来获得机会。但配位所描述的机制恰恰相反：配位物不是行动者主动“嵌入”的——它被裂缝卡住的。1977年的决策者不是在“策略性地将标准化嵌入社会结构”，他们是面对着裂缝的巨大压力，在所有选项中只有标准化能同时顶住两股对冲的力。这不是主动的策略行为，这是被动的结构性被迫。嵌入性理论可以解释行动者在既有结构中的策略选择，但它解释不了“结构裂缝本身的张力和压力”如何先于任何行动者的策略而存在，并事先限定了行动者的可选范围。这一点是配位与嵌入性之间最不可通约的区别。

七、配位禁止什么：三条分线与三个可观测量

第六节做了四笔与既有解释的对话，说明了配位不能被路径依赖、制度化、合法性机制、福柯、斯金纳、功能主义与嵌入性所替换。但那些辨析都停在“我不是你”的层面。真正的检验是另一件事：

在同一批材料上，配位与它最近的邻居会不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如果答案总是相同，那么"配位"就只是一个换了措辞的旧机制。本节给出三条会给出不同答案的分线，以及三个可以让分线被实际裁决的观测量。

7.1 与多源流框架的分线：耦合，还是排除？

金登的多源流框架已经确立了政策方案如何被选中的一套机制：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各自独立漂流，在政策之窗开启时被政策企业家缝合起来。这套框架的核心动词是**耦合**，其关键变量是企业家的在场与活动强度。第二节所还原的 1977 年那个历史现场，在多源流的语言里是一个标准案例。这一层已经被占据，本文不能把"方案在库存里等待时机"当作自己的发现。

本文的机制却是另一个动词：**排除**。裂缝把所有其他方案挤出去，剩下的那一个被逼成唯一解。两个动词指向不同的观测后果。

由此得到第一条分线：**多源流预测，可辨认的倡导者及其活动强度是方案胜出的必要条件；配位预测，当裂缝两侧的压强都足够高时，即使没有可辨认的倡导者、方案本身也无人主动推销，它仍然会浮上来。**

可观测量之一：**存活方案数**。配位预测，在决策记录、会议纪要与内部讨论材料中，被认真讨论的备选方案数会随两侧压强的上升而**单调收敛至一**；多源流不作此预测，它允许在窗口期同时有多个方案竞逐，胜出取决于耦合的技巧。

裁决规则：若在同类的分选制度变革事件中，历史材料显示备选方案数在压强峰值时并未收敛，而是靠某一位倡导者的持续活动才最终定于一，那么排除机制让位于耦合机制，本文第二节的核心论证应当改写为多源流的一个地方性案例。

7.2 与文化工具箱的分线：工具会不会改写目标？

斯威德勒的"文化工具箱"已经确立：行动者从既有的文化曲目中取用当下合用的部件，而不是被某种价值观从头驱动。本文所说的"社会在已有的思想库存里搜寻"，与这一层重叠，优先权归斯威德勒。

本文剩下的分工全部集中在第二节第五小节的"回塑"上：工具箱理论不预测**工具会反过来改写使用者对目标的理解**；本文预测它会，而且这正是本文相对于工具箱理论的唯一增量。

由此得到第二条分线与第二个可观测量：**取用一件配位物的时间越长，使用者对"目标本身"的定义应当越向该配位物的形状收敛**。在本文的案例中，"目标本身"就是"什么算公平"。可测的量是：在统一考试制度下受教育年限不同的人群，其对"公平"的操作化定义分布——是否把公平等同于"同一把尺子"、是否把引入人的判断一律读作"给关系留口子"。

裁决规则：若不同世代人群的公平定义分布没有系统差异，那么回塑不成立；而回塑一旦不成立，第四节关于"商鞅已与裂缝长在一起、因此最难被替换"的全部论证也随之失去支点，本文将退回为路径依赖的一个措辞变体。

7.3 与系统正当化理论的分线：一般性辩护，还是特征性辩护？

这是三条分线中最锋利的一条。乔斯特与巴纳吉的系统正当化理论已经确立：处于劣势的一方会为了使处于劣势的制度辩护。第二节第四小节所描述的"三重心理机制"——保留希望、维护自尊、避免认知失调——与这一层高度重叠，必须承认它已被占据。

分工在于辩护的**形状**。系统正当化预测的是对制度的一般性辩护：处于劣势者倾向于把现行安排合理化，不论这套安排采取何种形式。配位预测的却是一种特征性的辩护——它只附着在"非人格化计量"这一个属性上，因为正是这个属性让配位物能同时从裂缝两侧受力。

这给出一条可以用问卷直接分离的对立预测：**同样是在分选中落败的人，对"统一分数线"的辩护强度应显著高于对"同样使他们落败的主观评审"的辩护强度**。系统正当化理论不预测这个差——在它的框架里，两者都是使自己落败的现行制度，都应当被合理化。

可观测量之三：**辩护强度差**。裁决规则：若两者的辩护强度没有显著差异，那么第二节关于配位物结构的全部论证——"恰好能同时从两侧受力"——就失去了心理层面的证据，本文应当被并回系统正当化理论。

7.4 禁止清单

其一，高压强下备选方案数不收敛于一——排除机制失效。

其二，不同世代的公平定义分布无系统差异——回塑失效，本文退回路径依赖。

其三，落败者对主观评审与对统一分数线的辩护强度相同——配位物的结构性论证失去支撑。

其四，出现一种在效率与公平两侧都更优、且不依赖非人格化计量的分选机制并稳定运行——第五节的情景三成立，本文关于"唯一不滑脱"的判断到期。这一条与前三条性质不同：前三条若发生，说明本文错了；第四条若发生，说明本文对了但已经过时。一个诚实的分析应当同时写下这两类结局。

7.5 关于第二节所用浙江案例的一点补充说明

第二节引用的浙江选考案例，已按实际过程订正：2017 年首考之后出现的是物理选考人数的下滑，浙江省于 2018 年 1 月设定物理选考保障基数以托住人数。需要说明的是，这一事实方向对本文既更有利、也更危险。更有利，是因为它显示多元化尝试确实会被"等值与公平"的话语拽回既有形状；更危险，是因为保障基数本身是一次**成功的行政干预**——它证明裂缝并非完全不可操作。本文因此不主张配位物绝对不可撼动，只主张撼动它需要的不是更好的理念，而是能同时顶住两侧压力的替代结构。

7.6 本文不主张的事

本文不主张当代的分选机制是商鞅思想的继承或复兴。第二节已经指出，1977 年的决策文件中没有出现过商鞅的名字。本文使用"商鞅逻辑"这个说法，指的是一种可辨认的机制形态——用不容辩驳的量产指标取代带人的判断的评估——而不是一条思想传承的谱系。任何把本文读作"传统文化决定论"的

引申，都与本文的论证方向相反：本文的全部力气恰恰用在说明，是当下的结构裂缝在挑选思想，而不是思想在决定当下。

八、结语：思想史如何问“为什么是这个”

本文的追问，是把思想史的一个老问题重新打开了一次：一种思想在长时段里持续地、切切实实地改变着大量普通人的行为——它凭什么？传统的回答是：因为它深刻、因为它正确、因为它回应了人性的普遍需要。本文的回答是：这些回答说的是思想自身的品质，但品质不能单独解释在场。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裂缝在持续地把这个思想配到它需要的那个位置上？

在这个进路下重判商鞅和王阳明在当代的命运，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商鞅不是被“信奉”了两千年，而是被“公平”与“效率”的二律背反反复配进了中国分选机制的核心。经过四十多年的标准化筛选运作，配位物已经在认知、制度和身体三个层面反过来重塑了裂缝的感知——裂缝和配位物从“配位”深化到了“共构”。因此，即使将来公平压力的某些原始动因减弱，商鞅逻辑也不会自动退场——社会的公平直觉已经长在了这个配位物里，整个培训产业和学区房经济缠绕在它上面，几代人的身体已经被它规训得只认得这一种竞争方式；拔掉它，社会将不知道用什么来感知公平。王阳明不是被“发现”了精神价值，而是被“功利”与“意义”的脱节配进了中产精神消费的货架。在前者的裂缝里，商鞅是唯一被卡住了的——其他方案在这个特定裂缝中都滑了出去；在后者的裂缝里，心学是恰好配上了的，但它没有被锁死，替代品大量可得，而且它自身的硬度不够支撑它完成对裂缝的回塑，因此它随时可以被换掉。

当一道裂缝长期没有配位物——张力裸在那里，社会直接承受矛盾——此时可能孕育出新的结构。当代中国的情形并非如此。公平-效率裂缝一直有一个商鞅逻辑在顶着：张力被配位物吸收了大半，紧迫感被缓解，逼出原创方案的内在压力就小了。如果未来某一天，这个裂缝中的标准化配位真的松动了——旧的配位物滑脱了，新的本土构想才有可能从裂缝本身的形状里长出来，而不是从已有的思想库存里被反复配取。

本文核心判断的证伪条件是明确的。如果在未来，以下任意一种情况被观察到，本文的判断即在事实上被推翻：第一，“公平-效率”裂缝中出现了另一种分选机制，它同样能同时从裂缝两侧受力且比标准化更精准、更公平、更不易引发争议，并开始大规模取代标准化筛选；第二，相当规模的人群——不是零星的特例，而是跨阶层的、可被识别为社会趋势的——以心学的克己实践（而非仅仅是悦耳的心理安抚）替代了对功利赛道的全身心参与，在生活方式上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渡。换言之，本文要求自己的论敌不是一个更聪明的反例，而是一个能够在经验中被观察到的、改变裂缝与配位物之间当前耦合状态的实际社会变动。一个核心判断，只有把推翻它的条件明确地写在这里，才算真正承担了它可能被推翻的风险。

修订说明 · REVISION NOTE

本文为二次审稿打磨版之后的编辑修订版，共两轮。**第一轮：**（一）补入此前未曾交代、却与本文核心论断距离最近的既有文献，并逐一说明哪一层已被占据、本文还剩什么，不以未引为独创；

(二) 核订文中涉及的事实与年份；(三) 清理不属于本文论域的外来术语。**第二轮**：新增一节，把与最近邻文献的关系从“辨析”推进为“可裁决的对立预测”——逐条写出本文禁止哪些可辨认的事态、给出使这些禁止能被实际检验的观测量或编码规则，并明确划掉本文没有主张的部分，以免论断在传播中被放大成它承担不起的形态。两轮修订均未改动作者原有的论证结构与核心判断，新增内容只做一件事：把原有判断置于可被推翻的位置上。—— 编辑：Claude

声明 · NOTICE

思想拓展声明：本智能体（SDE 金点子发生器）产生的任何论文与文本，均作为“思想拓展功能”提供——是 AI 在特定方法引导下的思想实验与观点探索，用于拓展思路、激发思考，不构成正式学术研究成果或事实性结论；如需正式使用，请自行核验并遵守学术规范。

参考文献

1. 陈立胜, 2019, 《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邓小南, 2014,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 蒋礼鸿整理, 1986, 《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
4. 刘海峰等, 2002, 《中国考试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5. 吕妙芬, 2003, 《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6. 余英时, 2012,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 郑良树, 1998, 《商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8. Arthur, W. Brian, 1994,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9. David, Paul A.,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pp. 332–337.
10.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Pantheon Books.
11. Mannheim, Karl, 1952,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Routledge, pp. 276–322.
12. Pierson, Paul,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pp. 251–267.
13. Skinner, Quentin, 2002,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1: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Yan, Yunxiang, 2010,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Bloomsbury Academic.
15. Boltanski, Luc & Thévenot, Laurent. (1991). De la justification: Les économies de la grandeur. Paris: Gallimard. [英译本: On Justification: Economies of Worth, trans. Catherine Por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 Cohen, Michael D., March, James G. & Olsen, Johan P. (1972).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7(1), 1–25.

17. Jost, John T. & Banaji, Mahzarin R. (1994).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System-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sciousn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1), 1–27.
18. Kingdon, John W. (1984).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 Okun, Arthur M. (1975).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 Pierson, Paul. (1993). "When Effect Becomes Cause: Policy Feedback and Political Change." *World Politics*, 45(4), 595–628.
21. Sandel, Michael J. (2020).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2.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73–286.